

ZHENGZHIXINLIXU

(美) 威廉·F·斯通 著

胡 杰 译

政治心理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政治心理学

(美) 威廉·F·斯通 著

胡 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第 一 部 分

政治行为研究导论

第一章

政治和社区研究

我们是“自由恋爱者”，但爱情对我们的约束和责任并不少于普通婚姻。

——《欧奈达手册》

不管社会主义者（公有社会的成员、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徒等）的信仰如何，他们都把自我的对立面和社会看作是虚假的东西，它反映了流行的贪婪和支配伦理。他们幻想的目标是，回到完美的社区初期中去，即回到地球上的天国时期或合作的联邦时期中去，这两个时期都体现了美国的希望。

——艾伯特·弗里德：《美国社会主义》，1970年

你觉得这样一种社区怎样？在这种社区里，每个男人都可以与公有团体中的每个女人结婚；这里没有那种体现了“特殊爱情”的传统婚姻；社区的每一成员都必须爱其他所有的居民；如果采用了避孕方法，⁶³两厢情愿的成人之间就允许发生性关系。

实际上，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30多年，实行这些制度的不是嬉皮士的公社，而是一个叫至善论者的宗教团体。从1848年到1888年，欧奈达社区的成员实行了他们称之为圣经共产主义的制

度，其内容包括互相占有财产、共同生活、生产互助和奇怪的杂婚理论。他们声称圣经为所有这些活动提供了辩护，但他们还是遭到了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某些居民的谴责。不过，由于欧奈达人的生产互助、诚实和他们对宗教的笃信，他们也赢得了尊敬（卡登，1969年）。

作为19世纪初在美国建立的许多社区之一，欧奈达社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获得了相当长时间的成功，并比其他大部分公有社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些社区最后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虽然欧奈达人为了共同富裕工作起来十分艰苦，但考虑到他们过着愉快的生活，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和快乐的业余消遣，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女人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因此，人们自然会对他们放弃这一切感到迷惑不解。这里面的奥妙就在于人的心理考虑，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设计出来的机构以及允许在社区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实验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通过社区及其产生的描述来开始我们更为详细的讨论。

欧奈达社区建立者和领导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是佛蒙特州一家零售商店店主的儿子。诺伊斯1830年从达特默思学院毕业之后，到一家法律事务所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去安多弗神学院学习神学。他的善于探索的性格将他引向了对当时神学改革的探索，随后，他又来到了更加自由的耶鲁神学院。在耶鲁，他被至善论者的神学所吸引，信奉这一神学的复兴者们否认人的堕落的理论。他们声称，“人可以在人与上帝之间达到一种至善的爱的境界”〔卡登，1964年，第4页〕。

诺伊斯以他特有的热情接受了这种有关人与上帝关系的“神圣理论”以及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达到至善的其他信条。他的过分热情使他宣布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他是至善的。对于耶鲁大学的教师来说，这种自高自大的行为太过份了，他们

要求他交出布教的许可证。后来，纽黑文小型“自由教堂”里那些对诺伊斯的急进观点怀恨在心的人又投票免去了他的教职。

虽然诺伊斯被免去了教职，然而他却在23岁之际开辟了一项崭新的事业，这就是他宣传与人际关系、社会主义和婚姻制度有关的急进观点的至善论的结果。甚至对那些非正统的至善论者来说，他的异端学说也具有极大的魔力。诺伊斯声称：“基督的再临来到了；人是可以至善的；一旦得到了拯救，人就不会堕落；人不应该允许教会权威否决他的内心信念”〔卡登，1969年，第6页〕。

在离开了纽黑文之后的十年里（1834—1844年），诺伊斯思想的发展在不同的期刊上都有记载，这些期刊也包括他自己编的《至善论者》和稍后一点的《证明》。作为一位多产作家，诺伊斯在这些期刊和稍后的论著中记述了圣经共产主义的发展。在59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名叫《美国社会主义史》的书（1870年），在这本书中，诺伊斯概述了他的下述信念，圣经为公有生活和他本人对传统婚姻的反对态度提供了辩护。

随着他的特殊的“至善论”信徒的日益增多，诺伊斯在1846年开始将他的主张付诸实行了。就在那一年，他与他的追随者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建立了一个社区。每一成员都将自己的财物交给社区并同意共同生活，他们不仅共享着财富，而且在“杂婚”的活动中共享着彼此的爱情。当这后一项活动被普特尼人知道之后，诺伊斯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人们指控他在他的房间里鼓励野蛮的放荡行为，纵容自由恋爱、乱交甚至乱伦”〔弗里德，1970年，第28页〕。由于更大社区的竭力反对，诺伊斯1848年被迫与他的追随者一起来到了纽约州的中心欧奈达地区。

于是一个最著名的乌托邦社区的历史便由此开始了。由于有明确的宗教依据和有魅力的领导者，至善论者不久就建成了一个

在社会范围内（少数几年也在经济范围内）能够自足的社区。弗里德对欧奈达社区人的生活作了这样简单的描绘：①

在定居的第一年内，他们就在欧奈达奠定了“圣经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他们及其子女——总共50个居民住在他们自己建造的一个四层楼的楼房里，他们清理了地面，准备耕种。不过这时还没有明确的分工，妇女与男人一道干着相同的活。在工作时，妇女的衣着简朴，外表也没有什么打扮。在外部世界看来，她们的实用服装（她们常穿灯笼裤和便裤）和短发都是出于性活动的需要。虽然至善论者努力劳作，并尽力削减开支，但在最初几年，欧奈达还是赔钱。诺伊斯认为原因很明显：社区对农业的依赖性太大；只有转向手工业，社区才能得救。事实上，欧奈达生产了优质的铁制捕捉机之后，它的命运就变好了。这一冒险事业的成功使得诺伊斯又建立了其他几个有利可图的企业——如缝补丝织品，包装果品以及制造银质用器。欧奈达的人口在1855年增加了五倍，可是每人还是有干不完的活。在那个时候，欧奈达已经呈现了一个富裕的、管理极度优良的资本主义公司的景象。〔1970年，第28—29页〕。

欧奈达社区成员的人数在不断地增长着；开始是50人，1849年增至87人；1856年又增到180人。到1880年成员人数已达到了288人之多〔卡登，1969年，第41页〕。

① 节选自艾伯特·弗里德：《美国社会主义》（1970年）。

第一节 欧奈达社区的生活

在我看来，欧奈达社区的生活有三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乌托邦社区的成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1) 领导和管理；2) 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3) 与社区外部世界的联系。我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方面，如读者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情况，还可阅读其他一些出色的著作，如马伦·卡登（1969年）的《欧奈达：从乌托邦社区到现代公司》。

欧奈达社区的领导和管理

至善论和欧奈达公共生活的实验基本上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一个人的创造。据弗里德（1970年）称：“……他设想了它，建立了它，管理了它，也预见到了它的灭亡〔第26页〕”。弗里德的观点大致说来是正确的。诺伊斯的影响在社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计划就是整个社区的计划，成员们都忠于他和他的哲学。尽管在社区的管理中居民只有一个声音说话，但严格说来，欧奈达的统治还不能称一人统治。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的有一个委员会监督着至善论的实施，而这个委员会就是由一组年长的和在精神上居领导地位的“中心成员”组成的。在日常生活的运转中，诺伊斯并不是不可缺少的，这已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明，他有好几段时间没有在欧奈达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中，诺伊斯在纽约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康涅狄格州的沃林福特的一个小社区他也呆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与严格的一人统治的观点不同，欧奈达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参加日常会议。

为了交流信息，每天晚上8点成员们都聚集在曼逊大楼（社区住宅）的一个中央大厅里。平时他们大都是倾听诺伊斯的具有指导性的讲话，或者如他不在时，那就倾听一个中心成员宣读他事先准备好了的讲话。然后成员们讨论他的思想，阅读外面传来的信件等。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发言，争论通常围绕着至善论者的理想展开。妇女们也被鼓励讨论她们所关心的事情，但比较而言，她们在这类讨论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参与。在这些日常会议上并没有规定严格的议事日程，如有必要，指导社区生活的不同的委员会均可作出报告。卡登（1969年）说，“晚会不仅仅是让成员们记住理想，它还说明了如何实现这些理想，并设法为他们解决冲突。在成员参与讨论之后，他们感到对作出的决定更负有责任了”〔第48—49页〕。

可以作为社区控制机制的另一项活动是“互相批评”。社区可以挑选一个人作为批评的对象，或者某人也可以自愿接受人家的批评。批评通常由一个1至12人的委员会提出，如情况严重，这种批评也可由全社区提出。一名成员可以由于任何一项可觉察的错误而受到批评，特别是当他对社区的某一特定成员具有执着的“特殊爱情”之后，更是如此。因为每人都要依赖其他成员的赞同，所以批评活动能极有效地加强社区规范。社区内没有制约成员的正式程序；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须要求成员离开社区，不过从规章上说，这样做要得到大家一致的同意。

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

欧奈达社区的所有财产都是公共占有的：新成员将他们的财产交给社区。共享财富的哲学导出了共享社区成员爱情的结论，至善论者所依据的信条是：“人所构成的财富与物所构成的财富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见诺伊斯的“圣经共产主义”一文，引自弗里德，1970年，第55页〕。诺伊斯认为，传统婚姻是一人对另一人的垄断。至善论者的理想就是要平等地爱社区内的一切成员。这一观点通过杂婚活动在性关系中得到了应用。

对于“圣经共产主义”的献身，加上成员们相对孤立于外部世界，使杂婚成了社区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实际上，这种婚姻制度绝不意味着自由恋爱，对传统婚姻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经过精心调节的变通办法而已。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私人房间。如果他或她需要的话，就可以要求与社区内的任一异性成员“会面”（性交的委婉说法）。但是，这些结合仍在中心成员的监视下进行。他们时刻警惕着被禁止的对某一特定个人的“特殊依着”得到发展。虽然会面是在相互同意之后进行的，但女人在同意某些精神上的重要男性中心成员提出的要求时，总是感到了某些压力。同样，年轻男子在向女性中心成员提出要求时也需要具有某些美德。

生育控制要靠诺伊斯提出的男性节欲手段来完成，这是他为性交提出的一个术语，意思是说男人在进入情欲高潮和射精之前必须立即停止。小孩通常是“事故”的结果；不过，大多数小孩都是经中心成员同意后按照计划生下来的。

虽然社区的创始成员带来了许多有用的技术——耕种、手工艺和饲养家禽——但是早期的生活仍然是清苦的。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还不能保证富足；新加入成员贡献的财物要用来抵偿债务。只有凭借工业的收入，欧奈达才能在财政上自给自足。在整个欧奈达的历史中，都特别重视工作道德。社区的工作实行某种轮换制，每人包括诺伊斯在内都得担负手工劳动。妇女主要是照看房子和小孩，但也要与男人一道参加田野和车间里的劳动。当人们现在才考虑工作的多样化、性自由和摆脱繁重的分娩和抚养小孩

的痛苦时，欧奈达妇女与她们那个时代的其他妇女相比，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解放”。

与社区之外的关系

虽然欧奈达社区的性制度已经超越了它周围的村庄和州所允许的限度，但它仍与邻居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这些友好关系开始于1862年，主要接触对象是从社区周围地区雇佣来的工人。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工人人数也在日益增加，截至1875年止，已雇佣了200名外地工人。对于这些工人的良好待遇，提高了社区在与周围邻居交往时的诚实可信的声誉。这种友好的气氛挫败了一两个愤怒的牧师指责社区生活不道德的企图。

然而欧奈达社区的灭亡却由于它偏离了更大的社会规范而加速了。随着诺伊斯的年迈，他对扩大至善论的兴趣也渐渐减弱了。体现在至善论神学中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也出现了衰落趋势。于是削弱了社区应付内部纷争的能力。1879年对一年轻女子传授杂婚知识引起了一次尖锐的争执。早年诺伊斯自己曾向一些十五、六岁的女孩介绍过性经验，后来诺伊斯任命了另外一两名男性中心成员作为“第一丈夫”。但是持有异议的其他中心成员与反对诺伊斯权威的男女成员联合起来了。除了这一争执外，周围地区的一些牧师也对至善论的道德沦丧进行了新的攻击。

面对着来自内外法律行动的威胁，诺伊斯这位杂婚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逃往了加拿大。此后不久，一个行政委员会接管了欧奈达。不过这几名委员会的成员对于制止杂婚的方法却没能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他们在1879年用投票方式终止了这一活动。原欧奈达社区的成员不得不在一夫一妻制和独身生活之间进行选择。一年之后，也就是1880年9月，社区作为一个联合服务公司，即

欧奈达社区有限公司重新进行了改组。虽然那里面还有很多原社区的成员，但是乌托邦实验的所有意图和盘算都被终止了。

第二节 欧奈达的教训

在评价欧奈达社区的历史中，我发现，那些从欧奈达生活中得到了不少报酬的实践者们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又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我所以要较为详细地考察欧奈达的历史，是因为，我认为欧奈达社区以一种缩影的形式反映了困扰人们生活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是家庭和社区内互助的必要性与个体对自治和独处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从部族到民族等各种利益互不重合的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在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之中，欧奈达只取得了脆弱的平衡。马伦·卡登〔1969年，第104页〕将欧奈达说成是“脆弱的乌托邦”，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平衡。

我与卡登的分析大体上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强有力的领导是欧奈达社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他的逐渐退出及最后脱离社区则导致了它的灭亡。我们还认为，杂婚的实践及放弃影响了乌托邦实验的进程。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卡登提出的四个因素，因为它们对其他社区具有普遍意义。这四个因素是：（1）意识形态的重要性；（2）社区人的性格；（3）个人意愿和集体参与的冲突；（4）有效的管理。下面我依次对这四个因素进行讨论。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我对欧奈达异端生活的过多描述可能会使人们忘记它基本上

是一个宗教社区。总的说来，社区的一切生活都是在至善论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对于一切个体之上的这些原则的共同信仰产生了使社区成员在一些烦琐的争论面前紧密团结的凝聚力。共同的意识形态，即对“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要”的某些事物的信仰是社区命运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欧奈达来说，这一原理也通过下述事实显示出来了，当社区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兴趣降低之后，社区的生命力也就随之减弱了。

社区人的性格

我已指出，参加社区的人都是至善论的信奉者。除了信仰的作用之外，另外一些较微妙的因素也是有作用的。卡登（1969年）认为，社区吸引的是一些具有某种心理倾向的人。她写道：

“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出，只有那些有特殊心理性格的人才会觉得欧奈达的至善论具有吸引力”〔第107页〕。例如，卡登还指出，至善论中有关免去生来罪孽的诺言特别容易吸引那些没有摆脱罪恶感的人。对于某些成员来说，诺伊斯的形象和理想化了的社区代表了他们的爱情追求。此外，人们还注意到欧奈达人的这种心理兴趣，即可以发生不同的性关系而又不会犯罪。最后，那些依赖需要极强而又不能与他人形成友好、亲密和信任关系的人也从这种社会得到了满足，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禁止“特殊的”依着。

个人意愿和集体责任

欧奈达社区的成年人都是分屋而居的，但是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没有超出社区的监视之外。这里要求对一切都得参与，对一切都得负责。成员首先要为社区着想，然后才能考虑自己的愿望。

卡登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欧奈达货物的推销员因与顾客谈话取乐的时间过长而得到了惩处，并分给了别的工作。对个人来说，甚至是集体同意的性自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进行外界禁止的种种性活动，他们也放弃了建立彼此满意的情感关系、体验性行为高潮和挑选他们自己相中的情侣的权利”〔卡登，1969年，第106页〕。

社区的管理

社区的平稳发展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说明了社区的管理计划是有效的。由于对至善论理想的信仰以及认为社区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社区的活动在个人与集体利益之间取得了一个合理的平衡。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家务、娱乐、照看小孩和杂婚都是按照基本的理想组织起来的。诺伊斯根据至善论安排一切事务的天才也包括这样的灵活性，这就是允许已建立的社会秩序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如果在任一社会团体内产生了冲突，一个有生命力的社区就应该能找到应付这些冲突的办法。只要意识形态的基础牢固有力，那么欧奈达为此目的建立起来的独特机构就能够令人敬佩地运转。

第三节 当代社区

今天对十九世纪社区的介绍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对于共同生活的兴趣又在恢复；这些兴趣在美国许多地方建立起来的社区中已显示出来了。不少年轻人再次企图建立能够在爱情、和平与互助的气氛中生活的社区。根据心理学家B. F. 斯金纳的思想在弗吉尼亚州组织起来的特温树社区就是当代的一个典范（金凯

德，1972年）。罗恩·罗伯特（1971年）在《新社区》一书中对特温树社区和其他一些当代的实验作了描述。在我看来，这些当代社区一般都没有上一世纪那种指导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明确目的感。

对当代社区主义者来说，他们可以从过去的社区——如布鲁克社区、欧文社区和震教徒社区中得到很多教训。这些社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发端于对现存社会和经济安排的不满和对人们可以通过合作生活得更好的理念的笃信。因此，在大多数社区里，财产都是公共占有的。另一方面，这些社区之间也有很多差异。有些社区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有些则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各社区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例如，与欧奈达社区不同，震教徒社区根本就不让性交。

什么样的实践和信仰对一个有活力的社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还没有定论。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知道，许多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对公有生活有着强烈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供人们长时间地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里生活下去（最长的也许就是震教徒社区了，但由于没人分娩及缺少新的招募人员它也在消亡之中）。我并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只能指出，社区实验的缔造者们在对现存制度的暴虐本性作出反应的同时，忽视了建立新的政治系统的必要条件。

第四节 政治组织和人的本性

至少从理论上说，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可以互不相同的。比如，两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就可能在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其中一个国家可能是民主管理的，而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铁幕统治的。与此相类似，调整社会内部关系和家庭生

活的制度和法律也可以大不相同。

但是，从实际上，看来我们还不能发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可能的结合形式。在上述三种因素的独立变异方面，似乎还存在某些限制条件。一个国家有没有经历长期的独裁统治，这与强大的教会努力和“自由企业”不是没有关系的。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我们却不可以匆忙得出结论说：在这些特殊的因素之间一定还存在着某些密切的联系。美国许多作家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种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他们以为，社会主义与独裁主义之间只是一对一的相应关系，可是瑞典、大英帝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实践却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

确实有理由相信，高度集中的经济需要集中领导。其理由包括要对这种经济作出计划（海尔布若纳，1969年）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难题。我们可以回过头看看欧奈达的实验，如果说诺伊斯本质上是一位仁慈的专制者，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他为社区成员所爱戴，他不仅通过命令，也通过理智、高水平的个人活动和丰富的思想进行统治。尽管缔造者颇有独创精神，但是在他的权力和兴趣减退之后，社区还是不能长期存在。

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要与人的本性相适应，这些问题已被政治哲学家讨论了无数次。与政治心理学学者兴趣有关的另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趋向谐和一致的集体生活的冲动，这种生活在美国19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和今天的社区看来还很有生命力；个人和为己服务的动机与社会利益及对社区的期望是不是对立；个人生活和安排需要多少外来控制；民主的政治机构是不是特别适合于人的本性，等等。

我并没有为所有这些重大问题提供答案。但是我与那些相信人有能力与他人和睦相处的心理学家（如约翰·杜威，艾尔弗雷德·艾德勒和埃里奇·弗里姆）所持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都认